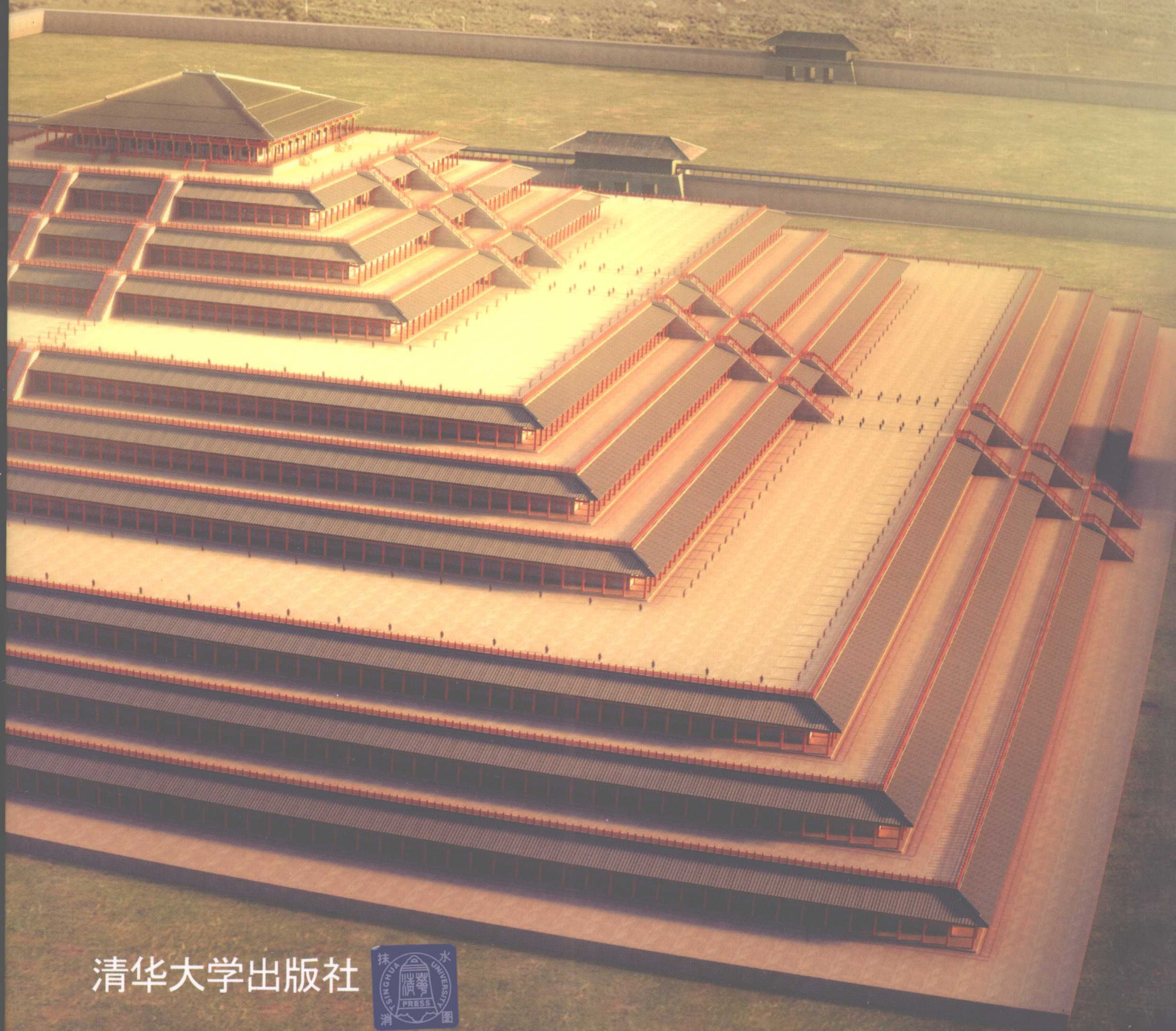


杨鸿勋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杨鸿勋 著

(增订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杨鸿勋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增订版)

杨鸿勋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1987年4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建筑考古学论文集》的增订版。原书包括作者利用古遗址材料所从事的建筑考古学研究的论文19篇,本书增加为66篇。

1987年版《建筑考古学论文集》,经国家文物局机关报《中国文物报》于2001年发起全国公投推选为“二十世纪最佳文博考古图书”论著类第一名,蜚声海内外。因此书早已绝版,读者颇有索书不得的遗憾。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特将此书增订再版。

本书内容包括:原始社会聚落,诸如西安半坡、郑州大河村、浙江河姆渡等遗址,以及夏代二里头宫殿、商代偃师和小屯以及盘龙城宫殿、周代的周原宗庙和殿堂、秦代咸阳宫殿与始皇陵以及绥中海边“碣石门”与“碣石宫”、西汉长安明堂和王莽九庙、洛阳北魏永宁寺塔、隋仁寿宫和洛阳则天门、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与麟德殿和华清宫浴殿以及青龙寺真言密宗殿堂等遗址的复原研究。作者通过遗迹、遗物,结合文献材料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得出可信的复原成果。其中,尤其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是,作者于1997年在日本权威学术杂志《东方学报》发表的论文,引用日本考古材料对照中国文献得出日本神社源于中国的结论,“彻底反转了日本上古史”,“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极大的震撼”,以致“使一些人哑口无言”(台湾学者著文评论)。另外,书中还包括有甄别认定新石器时代经济分期的重要工具——石楔和石扁铲,破解“黄帝时明堂”、“黄帝合宫”、“夏后氏世室”、秦以前墓上享堂,考订若干与建筑有关的象形文字,以及斗拱起源和凹曲屋面的发生与发展等论文,也特别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对中国建筑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字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本书对于文物、考古、建筑史、科技史等专业工作者和学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杨鸿勋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
(清华学人建筑文库)

ISBN 978-7-302-10930-3

I. 杨… II. 杨… III. 建筑学: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2484号

责任编辑:汪亚丁

版式设计:1802工作室

责任校对:焦丽丽

责任印制:王秀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购热线:010-62786544

投稿咨询:010-6277201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印刷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订者:三河市兴旺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210×285 印 张:43.25 插 页:2 字 数:1038千字

版 次:2008年2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98.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15016-01



秦始皇九层之台的陵上享堂鸟瞰图

(水晶石公司电脑制作)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
(作者手绘)



唐長安明德門復原圖

唐長安明德門
(作者手繪)



唐大明宮含元殿透视图

(作者手绘)

增订版序言

打倒四人帮,百废俱兴。198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文化部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制订出版规划。会议决定贯彻“四个现代化”、发展科技与文化事业,由国家一级出版机构负责出版知名学者的文集。优先出版“文革”中故去的老学者的文集;其次是选择当时健在的权威老学者结集;至于中年学者,由于多年“文革”运动的破坏,出版力量极其薄弱,规划中留出较小比例,从严要求,出版少数人的文集。笔者当时尚属中年,出版社在广泛征得建筑史学界以及考古学界老前辈们的意见,筛选之后决定在这一学科领域出版笔者的文集。1987年问世的《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就是这样约稿、出版的。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个人谋求出版著作相当困难,著作能够纳入国家出版规划,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奖赏。

2001年,国家文物局机关报《中国文物报》发起“二十世纪最佳文博考古图书”的全国普选,公开、公正的读者群众投票结果,拙作《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当选“论著类”第一名。因此书已绝版,多年来时有欲购不得的读者查询求购;普选之后,更多有函件、电话及网上询问购买此书的信息。为此,清华大学出版社与笔者商定再版此书。再版的此书,收入了笔者1978年以后发表的部分建筑考古学方面的论文,由原来的19篇增加到66篇。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之所以获得百年来最佳论著的荣誉,我想是因为它显示了“建筑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创始。三十年来,建筑考古学作为特殊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肯定。在我多次应邀访问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之后,日本有的国立研究机构已经将“建筑考古学”人才培养定为制度。中国台湾地区也极其重视建筑考古学高等人才的培养,台湾大学已先后三次向我发出前往指导博士研究生班的邀请。在文化体系不同的西方国家,也开始强调这一专业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2003年春,美国被誉“学术桂冠”的橡树园研究中心在华盛顿召开建筑考古学的分支——园林考古学这一方面的国际会议。由七个代表性国家的学者出席,两名列席,共计九人。会议研讨了园林考古学不同于普通考古学,如何发展这一学科的问题,与会者认为有必要成立“国际园林考古学会”以加强园林考古学研究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由于中国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我作为特约中国代表与会,会议重点听取了我对园林考古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国际学术组织的意见。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是以遗址材料为对象的科学研究论文集,虽然它已揭示了建筑考古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学科的基础,但是它还不等于“建筑考古学”的学科专著。全面表明这一学科架构的《建筑考古学》专著,我正在编写中。

感谢广大读者对拙著的认可!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学术发展的鼎力支持!我诚恳请求读者对此书提出批评意见,以求得个人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提高。

杨鸿勋

丙戌孟秋 于北京咫园

初版序言

“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物种的身体组织,研究遗骨的构造是重要的;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经济社会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马克思:《资本论》)依同理,要了解早已废毁了古代建筑形制及其发展的历史,考察其遗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古代遗物、遗迹为对象的考古学,就成了建筑史学极为密切的毗邻学科,甚至可以说,二者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含着的。从考古学来说,古城、古建筑遗址和古墓葬是同等重要的考察对象;就建筑史学而言,前期阶段缺乏或者没有完整古代建筑遗构资料,唯有依靠考古学才能获得文献所不能提供的实物材料。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普通考古学将会分化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建筑考古学”。建筑史学将随着这门新生的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得以步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

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自这门学科形成以来的半个世纪,经历了初期以现存古建筑实例的测绘为主要工作的史料收集、整理与初步研究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动员了几乎整个建筑史学界的力量,完成了部分史料的断代编排和初步分析的成果,编写、出版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这为进一步开展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重大的飞跃在隋、唐以前,若以土木结构为主导来说,中国古典建筑体系的奠定,约在东汉时期。这就看出,我们以往的工作仅仅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而已,真正围绕“发展”这一史学中心课题的研究,还有待我们向着隋、唐以前去努力开拓研究领域。当然,隋、唐以后的史料占有和建筑发展问题的研讨,还远没有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程度,我们的许多学者将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而作为当前中国建筑史学的薄弱点,也恰恰是中心课题的关键所在,则是前期的研究。因此,我们殷切期望有更多的建筑史学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一方面来。

对于历史的研究,无论是通过古籍还是古代遗迹、遗物,其目的都在于尽可能如实地去认识古代社会的各个不同的侧面。这就是说,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包括科学技术史在内的一切历史的研究,都是一项科学的复原工作。建筑史学要如实地阐明建筑发展的本来过程,首先要力求认识各历史时期建筑的原状。对于前期建筑来说,科学地考察遗址是重要的途径,这也就是建筑考古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可以说,建筑考古学的核心是复原研究。这正像普通考古学之对于古代的陶器,首先是根据残存的陶片复原成为整体;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不论是对于制陶本身还是通过陶器反映当时社会面貌,也仍然是一种复原认识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

苟同那种非议古建筑科学复原工作的见解。

对于古代遗迹的复原及建筑发展问题的研究,鉴于现存的问题,有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一是复原的首要原则,在于忠实于遗迹现象;另一点是,古城或古建筑的复原,需要借助于必要的科学论证。关于这一点,即要求建立严格的从遗迹出发的概念,决不可为了设计的“合理化”而任意改变遗迹形状或数据。古代遗迹所反映的多是我们知识范围以外的问题,这正是要求我们遵循客观存在的事实来进行探索的。如果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使我们有所发现、有所认识或设想,则不论是对其功能性质、空间与体形,还是结构、构造与材料诸问题,都允许存疑,决不可为自圆其说或复原图案的美观而作违背遗迹现象的发挥。关于第二点,即要求提高理论水平,或者说,不应只是抱着史料的观点,而是要有历史的观点。考古学的基本对象是实物,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与侧重文献的所谓“历史的研究”不同,就考古学的基本手段而言,它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资本论》第三篇第五章注5);恩格斯说得好:“自然科学只要在思维着,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假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切科学研究都是理论的研究,从残存的片断去认识整体,从孤立的、静止的例证去认识运动的、演变的历史,科学假说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近十余年来侧重于隋、唐以前的建筑考古工作。感谢海内外同行及出版部门的鼓励与支持,这次将有关这方面的部分拙作结集(部分篇章发表时限于篇幅有所删节,现按原稿予以补充;插图、照片略有调整),一则就算借以表明个人追慕前辈学者所开创的事业,并使之得到发展的夙愿;同时,也算借以表达个人对于建筑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管见。从个人来讲,我真诚希望得到海内外同行们的指教,以期有所进步。

著 者

1984年甲子春节 于北京徐园

目 录

增订版序言	III
初版序言	V

建筑考古学概说	1
---------------	---

第一部分 新石器时代·古史传说时期

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 探讨	15	“本土说”之颠覆	59
河姆渡遗址早期木构工艺考察	49	论“黄帝合宫”的形制——大地湾 F901 复原论证	69
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	55	从中日文化关系破解绳纹与弥生时代 的建筑遗迹	74
破解“黄帝时明堂”——日本神社			

第二部分 铜器时代·王国时期——夏、商、周

初论二里头 F1 的复原问题——兼论 “夏后氏世室”形制	89	妇好墓上“母辛宗”建筑复原	138
宗、庙一体建筑——二里头 F2 复原 探讨	96	殷晚期周原邦君宗庙——岐山凤雏 甲组基址复原探讨	143
偃师商城王宫遗址揭示“左祖右社” 萌芽	101	周原扶风召陈遗址初步考察	152
郑州商城台榭遗迹的发现——甲骨文 “𠄎”字的生活原形	108	破解“周人明堂”的千古之谜 ——“周人明堂”的考古学研究	158
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 建筑发展的几个问题	111	凤翔出土春秋秦宫铜构——金釭	164
盘龙城商代方国宫殿遗址复原 研究	121	“天下第一台”——楚灵王章华台的 考古学初探	171
小屯“殷墟”非殷都之墟	131	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	176
小屯殷都近畿离宫的殿堂与楼阁 ——甲十二与乙二十	134	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	197
		《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 要点的重申——答杨宽先生	202
		战国时期秦咸阳市第一号遗址复原 问题的初步探讨	204

第三部分 铁器时代·帝国时期——秦至清

破解中华土木大金字塔——秦始皇 九层之台的陵上享堂和负“九层 之台”的地宫	221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复原研究	375
秦帝国东海疆的“国门” ——“碣石门”与“碣石宫”	230	关于唐长安东宫范围问题的研讨	400
西汉未央宫前殿与椒房殿 复原初探	237	唐长安青龙寺真言密宗殿堂 (遗址4)复原研究	409
西汉桂宫明光殿复原研究	246	再论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原状	433
从遗址看西汉长安明堂(辟雍) 形制	257	唐大明宫含元殿朝堂复原探讨	458
略谈王莽九庙的复原问题	280	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复原 研究阶段报告	461
南越王宫殿辩——与“船台说” 商榷	282	唐大明宫三清殿与清思殿复原 初探	476
积沙为洲屿 激水为波澜 ——南越宫苑初露端倪	293	唐华清宫温泉宫殿复原初探	482
五华南越王长乐台原状的推测	302	武则天明堂(万象神宫) 复原研究	494
崇安闽越王宫前殿复原初探	305	唐长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与 勤政务本楼复原考证	507
今文学派九室明堂论的体现 ——东汉雒阳明堂	310	破解唐长安慈恩寺大雁塔形制 悬案	517
东汉灵台复原探讨	318	唐长安荐福寺小雁塔复原探讨	528
曹魏邺城的铜爵(雀)三台考	323	试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年代,兼及 传说的真实性问题	533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复原研究	328	吴越杭州西湖雷峰塔复原研究	543
北魏洛阳宫城凌云台凉风观——已知 最早的冷气设备殿堂	342	渤海国上京王宫初步复原考察	554
北魏复建洛阳宫城阊阖门形制考	350	西夏皇陵复原初探	567
唐长安明德门复原再论	357	北宋定州开元寺塔原状考察	575
隋唐洛阳宫城应天门复原考察	369	明北京奉天殿与两庑衔接探讨	580
		明清北京紫禁城外围值房的变迁 ——明“红铺”与清“围房”	586

第四部分 综合论述

论石楔及石扁铲——新石器考古中 被误解了的重要工具	593	中国古典建筑凹曲屋面发生与 发展问题初探	624
论古文字  、  、  、  的形和义	603	建筑考古三十年综述 (1949—1979)	637
斗拱起源考察	611		

建筑考古学概说

回首 20 世纪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是令人鼓舞的。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自从 19 世纪后半叶它在欧洲形成之后,于 20 世纪 20 年代即引进中国。它在中国传统金石学、考据学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与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时至今日,中国考古工作的收获和水准都位居世界的前列。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若干专业考古的分支学科又从普通考古学中分化出来,形成“特殊考古学”(Special Archaeology),与传统的“普通考古学”(General Archaeology)并列,成为现代考古学的两大方面。建筑考古学就是特殊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 考古学概况

要想了解建筑考古学,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考古学(Archaeology)。

近代科学考古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根本上讲,15 世纪开始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展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这便是考古学首先在欧洲出现的原因。考古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则是,欧洲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对古典时代语文和美术的研究,从而导致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文的搜集;进而对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古物发生兴趣。这种兴趣扩大到对所谓“近东”的埃及、巴比伦等更为古老的古迹、古物的探访和资料搜集。再一种促使考古学形成的政治因素是,英、法、德、丹麦、瑞士等西欧和北欧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成立,出于促进民族向心力的爱国主义,弥补记载本国历史书籍的匮乏,遂注意从先民遗留的古迹中去寻求发扬民族自豪感的动力。这便在学科发展上促成了考古学的形成。

先是于 18 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以从埃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掠夺来的古物在法国建立博物馆,促进了对古迹、古物的研究;在法国统治意大利期间,大规模地发掘公元 79 年毁于火山爆发的庞培城址。另一方面,在德国,J. J. 温克尔曼(1717—1768)以保存在罗马等地的古代美术品为资料,写成他的名著《古代美术史》,而被誉为“考古学之父”;1822 年法国学者 J. F. 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推翻了《圣经》关于上帝造人的神话;特别是至 19 世纪中叶,C. 赖尔(1797—1875)的《从地质证据来证明人类的古老》、C. R. 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T. H. 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出版,使人们懂得了人类的出现至少在数十万年之前。因为了解上古人类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可凭,去寻求古人类的遗迹就成为惟一的途径,这就使考古学的形成产生了新的推动力,从而确立了“史前考古”的概念。也就是说,考古学是从史前考古开始的。所谓“史前”,是中文的直译,看起来是不通的,因为即使猿人的历史也是历史,其原意是指“成文历史之前”。在考古学建立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考古学的内容只是“史前考古学”。这时,史前考古学已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1819 年,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 C. J. 汤姆森分析馆藏

史前古物,认为丹麦史前时代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这就是著名的“三期论”。J. J. A. 沃尔索(1821—1885)进一步将“三期论”用于田野考古的分期,并得到地层关系的证明。1834年他发表了《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从此使“三期论”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基础。总起来,一门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运用严格的近代科学方法从事调查研究的科学考古学便诞生了。作为近代考古学形成的标志,是1866年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国际会议”,这使得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普遍的承认。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设置了以史前时期的生产工具为主要展品的“劳动历史陈列馆”,起到了在人民群众中的考古学科普作用。到1912年为止,这种国际会议共举办过14次。1932年改为“先史学和原史学国际会议”,在英国举行。此后的第十二次会议仍在英国举行,会标加上副标题:“世界考古学会议”。大约从1867年开始,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诸如:普遍认同了汤姆森按生产工具分期的“三期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形成“考古学文化”的区分;器物“类型学”也趋完善;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判定;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化,等等。19世纪20年代初期,考古学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掘方法的改进。明确了发掘的目的不是挖宝,而是把埋藏在地下的古迹、古物揭露出来,了解其原来的位置、布局 and 后来的变化,这样便可以使因时间的推移而掩埋起来的人类历史得以展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埃及考古中才得以将史前文化与所谓“历史时代”的文化衔接起来。所谓“历史时代”,也是中文的直译,其涵义为“成文历史时代”。1917年后,苏联在考古学理论方面引用了L. H. 摩尔根和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期方法——按社会发展史划分的“三期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20世纪初叶,尤其重要的进步,是以具有一定地域“文化”代替了“时期”这一考古学分类的基本概念。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有了更大的发展。不仅大大向上推进了考古学上限(在肯尼亚发现了2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其下限也逐渐向下延伸,所谓“历史考古学”受到高度重视。在田野技术方面,如采用电磁测定法探寻遗迹;放射性碳素测定法、钾氩法、热释光测定法、古地磁测定法等测定古迹、古物的年代;采用X射线荧光分析法、电子探针法、中子活化法等分析遗物的成分等。另外,由于航空、航天、潜水和影像设备与技术的提高,促成了“航空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水底考古学”的创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考古学研究中都同样重视古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因素。英国学者J. G. D. 克拉克所著《史前欧洲经济的基础》一书,可谓体现这一思想的代表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以L. R. 宾福德为首的“新考古学派”,向传统考古学的繁琐哲学倾向提出挑战,主张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研究“文化过程”的科学,其目标在于探索“文化动力学”的规律。新考古学派起到了活化考古学的作用。至20世纪末,在前一时期各地域考古工作不断扩展的基础上,已形成了考古学的全球化。就史前考古学而言,1969年出版的克拉克著《世界史前学》一书,便是全球化或曰世界化的一个体现。

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这之前,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抱有占领领土野心,而纷纷派探险队到新疆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以掠夺古物。日本和俄国则在东北地区进行掠夺性的考古发掘。当时中国还停留在金石学的阶段,并未认识到近代考古学,也没有去野外做考古发掘工作。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学科建设工作,先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接着在甘肃和青海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石、铜,并用时代的遗址(他所推定的年代序列,在20世纪40年代为中外学者所纠正)。1927年中外学者联合发掘了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29年裴文中在该遗址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引起全世界的重视。同时,李济、梁思永等于1928年在河南安阳发掘殷墟,提出这里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的见解(笔者根据遗迹、遗物分析,确认为都城近畿的苑囿离宫)。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章丘的城子崖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931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岗遗址,从地层关系判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年代先后序列。于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和成文历史初期文化的基本轮廓展现于人们的面前,这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五十年间,富有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考古发掘的范围遍及全国各地;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苏秉琦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作为分支学科,建筑、陶瓷、铜器、农业、环境等特殊考古学也在逐渐形成中。高科技的断代检测手段已经建立;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等也开始建立起来。

在现时代,对“考古学”的理解概括起来是:其使命与历史学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如实地复原认识历史事物,其区别仅在于历史学是以文献为对象,而考古学是以实物为对象。到目前为止,“考古学”的内涵,其广义的理解为:通过对历史遗迹、遗物的研究获得历史知识;狭义地说,则是指获取历史遗迹、遗物的途径和方法,包括:调查、搜集实物资料的技术;整理、编排、保存实物资料的技术;测试断代的技术;审订和考证实物资料方式、方法。考古学的定义,虽无明确的规定,但现代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①其学科分类,一般地说,可分为“普通考古学”和“特殊考古学”两大类。所谓“普通考古学”,是学科初期按时代划分研究领域,它包括成文历史之前的所谓“史前考古学”与成文历史之后的所谓“历史考古学”两个方面。属于前者的为“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或在两者之间加上“中石器时代考古”);属于后者的为“铜器时代考古”和“铁器时代考古”;这些都以田野考古学为基础。考古学尽管应用了一些自然科学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它与历史学一样同属于人文科学领域;在学科知识的传授中,隶属于大学文学院。面对广泛的古代遗迹、遗物,涉及许多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以文学院的知识储备来说,对其认识是有很局限性的。例如面对古代瓷器、铜器、船舶、建筑……,因涉及各种工程专业知识,无论是在遗迹现象辨认的田野工作方面还是室内复原研究方面,都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通考古学应用现代科技新成就,不但在调查、发掘技术和遗物的年代鉴定技术上有新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面临复杂的古代遗迹、遗物对象,而与多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结合,突破了欧洲初创时考古学只按时代划分学科分支的限制,而开辟了以专业划分研究领域的分支学科。例如,陶瓷考古学、青铜器考古学、建筑考古学、农业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这些,相对普通考古学而言,可谓“特殊考古学”,也可以说是“专业考古学”。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

二 建筑考古学的创立与发展

以土木材料为主的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很突出的特殊性。其遗址与世界上许多砖、石体系的建筑不同,往往只保存一些夯土部件和少量残砖、断瓦、碎石之类,原来大量的木构所造成的形体一般不复存在,而不是像埃及、希腊、罗马的上千年的古建筑遗存那样尽管残破还仍然伫立着列柱、梁、枋和墙体。中国的古建筑遗迹,木构多已腐朽或焚毁无存,基本上是土中埋藏的一些土而已。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建

筑考古的难度。在西方,建筑考古学的问题并不突出,而在中国,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特殊考古学分支学科。创立“建筑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不同,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需要我们自力更生地去建设这一学科。

在所谓“特殊考古学”形成之前,在古物、古迹的考古学研究中,当然早就涉及到各种专业对象的问题,只是未能深入到专业的理性认识中去。例如,瓷器的考古学研究,只能是直观的、感性的“其薄如纸、其润如玉”之类的描述和对照已知瓷片或其样本来作定性的断代分析。只有当它与陶瓷专业结合之后,在硅酸盐和陶瓷工艺的专门知识基础上,才使陶瓷的考古学研究摆脱古董商和收藏家的鉴赏式的治学方式,而形成专业的定量研究的考古学分支。对青铜器的考古学研究也是一样,在尚未与冶金、铸造、焊接专业结合之前,其考古学研究只能是在“铜器”专业的外围,进行器形、纹饰、铭文的研究,只有当以金相学为基础的冶、铸专业介入,才使考古学研究深入到铜器本身的学科领域,从而形成了“青铜器考古学”。同样,对古代建筑、古聚落、古城市遗址的考古学研究,也是经历了一个由常识到专业的过程。不幸的是,由于建筑遗迹很少伴生物,而且遗迹也搬不到博物馆里去,在当时盛行“挖宝”,而着重墓葬考古的情况下,遗址是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的,因此造成了不少无法弥补的损失。另外,不论是建筑还是聚落、城市的遗址,对于它们的认识和研究,需要很多普通考古学以外的专门知识,这也是普通考古学一般田野发掘对遗址无意问津的原因。即使发掘,反映在发掘简报和报告中,对于建筑遗迹的表述往往也是一带而过,附图也常是示意性的,很难作为研究的依据。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田野考古就曾调查乃至发掘了一些建筑遗址,既有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之类的居住遗迹,也有成文历史之后的建筑遗迹,其中尤为著名的是,规模较大的铜器时代的安阳殷墟宫殿建筑群遗址。当时尚未形成“建筑考古学”的概念,而是以普通考古学对待墓葬的方法来对待遗址——遵循“挖到生土为止”的原则,大多是将夯土台基连同其基础全部挖掉,见到地基下的原生黄土为止。其结果是,一座宫殿遗迹发掘完毕,而发掘对象也随着堆积一起被扬弃了^①。当时在小屯遗址的发掘中,这种错误一再重复,可见发掘遗址不等于就是“建筑考古学”。类似这样非专业的问题,在建国以来的考古工作中仍然存在,尽管遇到夯土不再去掉了,但对遗址的发掘仍然是以普通考古学的概念为指导。例如洛阳太学遗址,由于自东汉以来,历经魏、晋及北朝几代的经营改建使用,使得遗址形成多层叠压状态,其复杂的打破关系对于具备建筑史学专业知识的人员来说,都是很难辨认清的。尤其是发掘开方不够,局部遗址现象更是无法辨认。在这种情况下,按建筑考古学的方法,必须保持上一层遗迹的完整,扩方直至揭露一座完整的建筑单元,以文字、测图、照相等手段完全记录了遗迹现象之后,经鉴定认为可以铲除以获取下层遗迹,再进行下层的发掘作业。但是20世纪50—70年代期间的若干次发掘,却是在不大的开方中作建筑物的局部发掘,在摸不清其总体的情况下,便局部解剖继续下挖,使得同时显露几层极小的局部现象。在极为混乱、不能辨认的情况下,只好放弃发掘,另行开方,依然重复上述错误,所以这一遗址至今没有成果而由于乱挖破坏殆尽了。在更多的情况下,涉及专业分析的遗迹现象,却是经常被遗漏或作出错误的判断,诸如: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在建筑塌毁遗迹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屋盖残迹明确显示了是泥背屋面,但还是从一般常识出发,画成茅草顶的“复原图”;并面对屋盖上塌落的卤缘防水泥棱——有直棱和曲率半径很小的弧形转折泥棱以及泥棱的尽端,还是按照陶器口沿复原的概念,复原成曲率半径较大的有如碗底的“圈脊”^②。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做出了“土柱”(早期柱洞被填土夯实后,再普遍垫土做成新居住面。发掘时,做掉了新居住面,而保留了比居住面更为坚硬的柱洞内的

① 石璋如·小屯·第一本
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
殷墟建筑遗存·台湾南
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1959。

② 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
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